

#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近代武术的权力转移与知识生产

王占涛<sup>1,2</sup>,戴国斌<sup>1</sup>,邵娜<sup>3</sup>

(1.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2.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3.淄博齐盛高级中学,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本研究以“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为主要视角,重新审视近代武术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事实,通过剖析近代武术文化生产的时代特征,从权力与知识的角度阐释近代社会精英参与并主导武术文化范式变革的本质。研究认为:在近代“救亡”主题下,社会精英的介入改变了武术原有的权力结构和知识生产的“小传统”形态,使武术在文化范式上进入“大传统”的范畴之内。而武术救亡作为社会精英理念的“顶层设计”,则须经过“知识”的俗世化才能够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最终形成近代国家救亡全民化的民族凝聚力。

**【关键词】:**大传统;小传统;近代武术;权力转移;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3)02-0025-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403.001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所谓“大传统”,是指都市上层阶级及知识分子以文字记载的文化,而“小传统”主要是乡村中通过口头传承的文化<sup>[1]</sup>。“大传统”的知识性内容都是脱胎于“小传统”的,但“大传统”一旦发展成熟就变成一个“典范”,“小传统”又转面向这个“典范”学习<sup>[2]</sup>。因此,“大小传统”分别指代“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等。这与《周礼》中“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以礼化俗,以其御民”的思想十分相近<sup>[3]</sup>。余英时<sup>[4]</sup>也认为:“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渠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不及的改变。”

根据“大小传统”的文化区分,在冷兵器逐渐淡出军营之后,我国传统武术回归乡村民间,其主体性质与文化构成寓于“小传统”的范围之内,是典型的“小传统”文化。然而,近代以来,在经历“救亡保种”的群体沉思之后,武术进入社会精英的视野,并在各界精英群体的影响下,过渡到“大传统”的文化领域。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既是对旧武术文化的解构,也是对新武术文化的建构,在这一解构与建构的历史性变换中,伴随的是武术权力的转移与知识

的重新生产。主体的精英化,目标的国家化,对象的全民化,近代武术成为关系民族复兴、国民身体改造的国之大事。据此,以“大小传统”为视角对近代武术进行重新剖析与再思考,既是对中国武术多元化发展样态的根源性厘定,也可为当代武术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意义。

## 1 权力转移:近代武术话语主体的更迭

近代武术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话语主体由武术人转变为社会精英,社会精英的主导重构了武术知识体系,武术的价值取向也由本体化发展为主转向功能化发展为主。

### 1.1 社会精英的武术话语权力获取

武术原本是一种民间自在的文化存在,通过门户进行人才培养和技术传递,并在人才和技术的相互生产中形成群体认同与社会关系<sup>[5]</sup>。义和团运动失败,清廷禁武,民间习武授徒尚须有当地绅商作

收稿日期:2023-02-19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9CTYJ18)。

第一作者:王占涛(1976—),男,山东鄄城人,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武术历史与文化。

通信作者:戴国斌(1963—),男,江苏宝应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历史、人类学。

保,更谈不上公开进行武术活动,再加上人们因“庚子赔款”迁怒于义和团事件,时人多对民间习武持反对意见。另外,近代自然灾害及兵患、匪患频发,大部分民间武术人的基本生活难以为继,很多拳师背井离乡涌入城市<sup>[6]</sup>。在“天灾人祸”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传统武术的原始生态被打破,武术人的话语权力逐渐丢失。

甲午以还,历史剧痛引发反思,人们将国弱的根源归因于民弱。严复<sup>[7]</sup>认为,近世中国衰弱的原因并非是“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而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梁启超<sup>[8]</sup>也认为,中国的振兴必须以提高全体国民综合素质为基本。孙中山<sup>[9]</sup>在政府公报中明确强调“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因此,在“列强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必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内外忧患,才是独立自强的根本出路”<sup>[10]</sup>。对“民”的意义的重新阐释,将人们的视线从近代以来国家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失败,转移到了民生衰退中来。近代救国方略的“民”化,使各界精英开始将“民”的建设——“强种”,作为“强国”与“救亡图存”的本源性工程,并通过倡导“尚武”来进行对“民”之身心的时代塑造。

受“日俄战争”启发,近代“识者之士,渐知拳术之为国魂”<sup>[11]</sup>。1909年,同盟会会员农劲荪、陈英士邀约霍元甲在上海成立“精武体操学校”,以期“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sup>[12]</sup>。1911年,同盟会京支部委员叶云表与形意名家李存义在天津创办“天津武士会”,以“传习中国固有之武术,锻炼国民之体魄”为宗旨<sup>[13]</sup>。随之各类武术组织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武术热潮再次掀起。近代武术组织区别于传统民间拳场的根本特征是社会精英的参与和操控,精英群体不仅以“救亡”来规划近代武术组织的发展方向,还以知识与科学作为垄断近代武术话语权力正当性的证明。向恺然<sup>[14]</sup>在《我个人对于提倡拳术之意见》中说:“有功夫无知识,教授不如不教授也。”王新午<sup>[15]</sup>认为:“即使去向大名鼎鼎的老拳师们探讨国术的真理,他们也是回答不出所以然来。”田镇峰<sup>[16]</sup>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并综合的眼光,来观察及实证现在一切属于技击术理等现象。”武术与知识、科学的结合使民间“小传统”的话语权

彻底丧失,近代武术在社会精英获取话语权力的同时进入了“大传统”文化时代。

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不仅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体现为民族救亡的重要表征,更表达为社会精英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不断推动,在这一漫长的转变过程中,正是精英群体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

## 1.2 近代武术人的身份重置与再生产

### 1.2.1 传统武术人的身份重置

近代武术话语权力的精英化转向,使传统武术人不再充当知识生产的主体,而是在社会精英的引领下积极贡献自身的技艺财富与社会能量。民国以降,大量武术人受聘于近代武术组织和各级国术馆,从传统开馆授徒的自主传承者,转变为强健民众、培养新型武术人才的民族体育传播者。武术人社会身份的重新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向来靠保镖护院、授徒设场、打把式卖艺来维持营生的现象逐渐发生转变,很多武术名家在近代武术社会动员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单从中央国术馆的聘用薪资来看,教授分三等,月薪从六十至二百四十元;教员分三等,月薪从二十至四十元<sup>[17]</sup>。当时“我国边土膏腴之地,每亩之值,不过一二元”<sup>[18]</sup>,最高级教授月收入相当于两百多亩土地的年收成,就是最低级教员每月也有二十元的收入,这比武术人的传统营生优越得多。另外,传统武术人不仅在近代武术组织中被尊为教授、教练,更被各级学校、工厂、社团、机关、军队争相聘为教师、教官等,前后相较,不仅社会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社会地位亦不可同日而语<sup>[19]</sup>。

### 1.2.2 武术人才的精英化再生产

“大传统”概念下武术人才的培养和传统的民间门户传承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再是为某个拳种派别培养传承者和接班人,而是为武术的全民化生产新型精英人才。

武术人才的精英化再生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其一,培育健全之人格。近代启蒙的核心就是养成民众的健全人格。蔡元培<sup>[20]</sup>指出:“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吴荣煦<sup>[21]</sup>认为:“无人格者,不可谓之人,无健全之人格者,不可谓之完人。”传统门户传承中,师徒之间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重塑新型人

格无疑成为近代武术精英化人才培养的根本出发点。陈炳藜<sup>[22]</sup>在《精武与人格》中将智育、德育、美育、群育作为新人格的四要素,中央国术馆则以象征着“博爱、平等、自由”的三民主义作为新人格塑造的依据<sup>[23]</sup>。其二,锻造坚强之意志。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基于塑造民族之精神,培养武术体育化、军事化、科学化之精英,而担负这一责任者必备健全之人格与坚强之意志。精武会会歌提倡“百炼此身如钢铁,任何威武不能屈”的精神<sup>[11]</sup>。中央国术馆《早起歌》中有“闻鸡起舞学古人,忧劳兴国逸易亡身”的警示<sup>[24]</sup>。此皆表达了意志品质对武术精英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其三,涵养复合之知识。受“新文化运动”和“国粹运动”两种文化思潮的影响,近代武术带有“科学化”与“国粹化”的双重特征。因此,在近代武术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中,既有代表西方知识系统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体育原理,也有象征本土传统文化体系的国文、历史、国术源流、国术历史等<sup>[25]</sup>。这种知识培养的复合化既是近代武术“大传统化”的具体表征,也是武术“大传统”格调得以延续的必然保障。其四,融洽多元之技术。武术的“大传统”是对“小传统”的范式革命,武术的“国有化”破除了传统门户的技术垄断,使武术技术的多元化成为可能。精武体育会等近代武术组织所聘请的武术名家基本涵盖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sup>[26]</sup>,国术馆系统中的任教武术家也几乎囊括了全国不同地域的各个拳种。

近代武术人身份的重置与再生产,实现了武术由“小传统”到“大传统”的主体转换,主体的精英化转向为近代武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与能动性。

### 1.3 近代武术产品性质的国家在场

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并非单纯是文化生产的精英化,更是民族救亡前提下终极目标的国家化,因此,近代武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始终伴有着国家在场。

首先,近代武术产品生产目的之国家化。近代中国国败民弱,各界精英呼吁尚武。梁启超<sup>[27]</sup>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尚武最先表现为兵操的引入,后来“人们又从‘身体活动’的相似性中发现了武术”<sup>[28]</sup>,最早于1901年,马良就聘请各派名家创编

“各科新武术,并新武术各科专书”<sup>[29]</sup>。时人认为“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sup>[30]</sup>。随后,各种武术组织相继建立,并以推广武术、研究武术,“期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为目的<sup>[12]</sup>,也正因此,才使武术得以在社会精英的推介下进入“大传统”的文化范畴,成为精英群体“借题发挥”的对象。麦克乐<sup>[31]</sup>在《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一文中,以“国粹体育之复兴,正如春笋之勃发”,来比喻当时中国的武术开展盛况。于是整顿民族体育,训练全国民众,成为“复兴中华民族”“挽回中华民族已失之自尊心与自信心”的重要举措<sup>[32]</sup>。“国粹派”体育人认为“提倡国术,为救中国目前危机的不二法门”<sup>[33]</sup>。沈书珽<sup>[34]</sup>更是提出“提倡拳艺,使普通男子皆精此道”的观点。由此可见,近代武术产品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服务于国家,是在“强国强种”的政治号召下,依据国家的特殊需求进行的统一“订制”。

其次,近代武术产品消费对象的全民化。近代武术生产目的之“国家化”性质,决定了其产品消费对象的全民化。刘慎旃<sup>[35]</sup>认为:“目前的出路,就是我们要拿很好的‘组织法’去组织四万万中国人。”因为“民众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我人要集中国力,充实国力,就要从集中民力,充实民力入手”,然集中与充实民力的途径在于训练与锻炼民众,而训练民众与锻炼民众的方法则莫过于国术<sup>[36]</sup>。在武术全民化与国家救亡的关系上,张之江持有肯定的态度,指出“要救中国,一定要使全国的国民,奋武、讲武、竞武才有希望”<sup>[37]</sup>。

在民族“救亡”话语下,若近代武术生产目的之“国家化”决定了其产品消费的“全民化”,那么其产品消费的“全民化”又反过来规定了产品生产的多样化。如为适合军队训练和作战而创编的“新武术”“破锋八刀”“砍刀术训练法”等;为适应青少年学生、童子军实际要求而编排的武术操;结合妇女、儿童及机关政府等群体的特殊情况而编排的太极操等。近代武术的产品消费涉及了军队、学校、机关、工厂、妇女、儿童、城市、农村等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人群。

近代武术产品的国家在场丰富了武术的文化内容,开辟了武术发展的多重空间,生产了武术康健国民与民族救亡的新知识。

## 2 知识生产:近代武术新文化图景的构建

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不仅标志着武术话语权力的转移,还体现为对武术知识的重新生产,这种新知识产生于新的权力结构,又反过来为新权力结构的合法性服务。

### 2.1 武术康健知识的新解读

尽管在武术史上曾有“搏刺强士体”与“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的康健观念,但近代武术知识生产对康健的文化解读,呈现出区别于武术传统康健知识的新特征。

首先,以康健之体魄塑刚毅之精神。近代武术康健知识的生产,不仅重视国民身体的改造,更注重国民精神的养成。蔡元培<sup>[38]</sup>认为:“精神者,人身之主动力也。”梁启超<sup>[27]</sup>把“无精神而徒有形式”看作是“蒙羊质以虎皮”。身体是精神的载体,“身体羸弱,则心灵意志,必皆衰弱”<sup>[39]</sup>。陈此生<sup>[40]</sup>认为:“提倡拳术的用意,是锻炼肉体,锻炼肉体的真意,是想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怠慢根性’暗暗地挑除。”也正是基于类似观点,近代社会精英才对“静坐”的康养方式给予了严厉批判。认为静坐最大的害处,就是使人趋于消极,把进取雄心消磨了<sup>[41]</sup>。因此,体魄和精神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惟有坚壮不拔之体魄携百折不屈之精神才能够“负重致远,而开拓世界”<sup>[42]</sup>。由此可见,近代武术的康健思想并非仅是满足于身体的无恙和生命的长度,而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亟需下,达到“养成仁爱义勇国民性之希望”的最终目的<sup>[43]</sup>。

其次,以康健之身体筑强国之根基。近代巨变,举国反思。由科技落后而联想到人种落后,由“病夫”之国而推及“病夫”之民。我国近百年来所受外人凌辱,“揆厥原因,盖由于国民无强健之体格,刚毅之精神”<sup>[44]</sup>。故“积病夫而成病社会,积病社会而成病国”<sup>[44]</sup>。因此,强健国民身体,塑造国民精神,无疑是“起积弱,培民气,强国强种”的唯一途径<sup>[45]</sup>。而“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民,始成健全之民族”<sup>[46]</sup>,则成为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举国认同的文化逻辑。禅者<sup>[47]</sup>认为:“我们精武的重大使命,就是将四万万病夫改造成强健的国民。”概在《精武体育会之前途》中云:“设立支部,锐意进取,使北粤男儿,尽化为干城健者。”<sup>[44]</sup>所谓强健国民,干城健者,其共同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武术来训练

或锻炼国民,重塑国民身体与精神,使之有充分的能力来“负起救国大任”<sup>[48]</sup>。

近代武术康健知识生产的强国性质,既是时代救亡形势的需要,也是每个国民进行武术习练的民族意识表达与身体体验方式。李铁鸣<sup>[49]</sup>讲述自身于精武会习武经历时认为:“行见受其益而成体魄健全之我,精神活泼之我,思想缜密之我,道德纯粹之我,抑将本此体魄、精神、思想、道德,进而服务于社会、国家,而成社会、国家之我。”这种以个人康健为始基,以民族、国家“康健”为鹄的的国民群体觉悟,从根本上映射了近代武术“大传统化”的知识新特征。

### 2.2 “救亡”拓展了武术的新知识

“救亡”不仅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也是武术“大传统化”的初始推动力量。当社会精英把武术作为国家救亡手段来承载“强种强国”上层治理理念时,近代武术的救亡知识生产也随之构建了国家全民化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其一,武术救国责任的国民化。“民”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成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但直到近代,“民”才从历代帝王政治治理的对象被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张之江<sup>[50]</sup>指出:“按照约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规定,我们全体同胞皆是中华民国之主人翁。”这种国家主权的国民化,也表征了救国责任的国民化,将近代国家救亡作为义务具象到了每个国民本身。因此,“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为国民者,应该怎样担负起责任,来拯救我们这垂亡待毙的国家”<sup>[50]</sup>,就由原本对军、政等上层精英的“职责”追遣,变成了对全体国民的本心发问。国家救亡责任的国民化为近代武术救亡的社会动员提供了理性依据和情感驱动,于此基础上,“我四万万同胞,无论南北,随时随地,皆应作最前线防卫之准备”<sup>[50]</sup>等类似号召才能顺理成章地在民心中落地。

其二,武术救国的可行性论证。“国难危机,兴亡有责,凡我同胞,分当救国,救之以道,任侠尚武,发挥国宝,拳勇技击。”<sup>[51]</sup>当近代科技与军事不堪对比于西方时,社会精英又在本土文化中发掘出新的国家救亡的可能性。梁启超早在《新民说·论尚武》中就列举了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日本、脱兰士哇尔等数国实例,对尚武救国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屹

立地球者,无不恃此尚武之精神。”<sup>[52]</sup>张之江<sup>[18]</sup>认为,“我国五千余年历史之所以不敝者,国术维护之功,居泰半焉”,随后以伏羲、黄帝、三代、秦汉为例,说明了中国古代国家尚武,平民习射,国运昌隆,雄视亚陆的历史“事实”。以“史例”为镜鉴,以自强为践行,一种他人能,我人亦能,古时可,今时亦可的民族自信得以重新树立。而孙中山对“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sup>[12]</sup>的论断,也在这一武术救国可行性的认定中获得了“确证”。另外,“淞沪战之经验”“喜峯口之大捷”,也“皆已证明,国术于现代战争,却有相当需要,在疆场之上,实有重大价值”<sup>[50]</sup>。在社会精英古今中外的多重论证下,武术救国作为近代武术的新知识进入全体国民的思想世界,并以一种深信不疑的民族信念,体现在“强种救国”的身体实践之中。

其三,武术救国的动员逻辑。“暴寇侵袭,国势阽危”<sup>[53]</sup>。“强种救国”的全民动员理念要求“人民不但要有尽忠报国的热心,还要有尽忠报国的能力”<sup>[54]</sup>。如张之江转述孙中山之语:“自己没有力量,什么主权,什么生存,便都保障不成。”<sup>[55]</sup>李芳宸在山东国术馆训话中感叹:“处在这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要想瓜分我国的时代,谁还敢担保我们五千年的光荣历史,和三千四百四十余万方里的土地,不被它们吞噬净尽呢。”<sup>[56]</sup>然而,报国能力从哪里来?我们应当用怎样的方法来获取这样的能力?无疑成为近代国人不可回避的话语追问。因此,国穷民敝的时代,鼓励和动员全体国民以武术来强种,以武术来救国,就成了应对和解决困境的最好办法。张之江<sup>[50]</sup>认为,国民练习武术于个人和国家有着双重作用,“个人的幸福是健身自卫,国家的利益,是御侮强种,关于救亡雪耻的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了。”近代武术救国的民众动员从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民族责任感出发,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救亡是近代武术新知识生产的元动因,也是规定武术新知识性质的意识前提,更是武术新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武术救国的社会化动员离不开对武术知识的重新生产,同样近代武术的新知识也必将以救亡作为其存在依据。武术新知识通过对近代救亡理念的承载、表达与传递,以民族责任为动员主题,以“全景敞视”为规训方式,清整和规划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身体行为,实现了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

对全体国民的力量整合。

### 2.3 武术知识对民族意识的强化

我国近代民族意识萌发于甲午之后,于九·一八事件爆发达到成熟。所谓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存在、地位、礼仪、价值和传统的自觉”<sup>[57]</sup>。王希恩<sup>[58]</sup>认为:“民族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感。”熊锡元<sup>[59]</sup>将其表述为:“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兴衰、荣辱、权利与得失、利害与安危的认识、关切和维护。”在近代知识生产中,培养和强化国民的民族意识,将个体责任与民族兴衰相关联,把民族利益作为个体生命情感得以展开的最高目标,成为近代国家救亡的重要特征。因此,“民族”一词成为凝聚国民力量的精神主旨和思想源泉,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个体力量不断群体化、国家化,而种族、民族、国族等名称也成为近代救亡言论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语词。萧忠国<sup>[60]</sup>认为,国民体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战斗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以民众之力量建立民族国家。所以,无论是早期对于兵操和西方自然主义体育的引入,还是后期对武术的科学化、体育化、军事化改造,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服务。

近代武术对民族意识的强化具体体现为人们以种族、民族、国族等为目标共同体的思想动员。精武会组建初期,为打破门户界限,强化民族力量,霍元甲指出,拳术应公有,若人各私密,安能望学术之进步,民族之自强<sup>[12]</sup>。陈公哲则把“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看成是“精武之大希望”和“精武之真精神”<sup>[53]</sup>。对“民族”的强调不但为精武会确立了开办宗旨,也为武术人突破门户,开创由注重个人利益向维护民族利益观念转变之先河。民族不仅是一种文化、种族与地域上的观念区分,更是一种关涉人们感性生活的情感认同。张之江<sup>[61]</sup>将民族主义阐释为国族主义,认为国族主义是对传统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的突破,国族本身即是中华四万万国民的生命与情感“共同体”。因此,这个“共同体”的振兴就要求其全体成员不畏艰难、习武强身,只有“身强种强国强,我们民族的精神,才能发扬,世界上的和平,才有希望”<sup>[62]</sup>。国家救亡,全赖国民振奋,民族复兴,须靠群策群力<sup>[63]</sup>!近代民族救亡不是某

个个体的义务、也不是某部分人,某些组织团体的责任,而是全体中华国民凝心聚力、同仇敌忾的共同担当。

近代民族救亡需求推动了武术从“小传统”向“大传统”的转变,而武术的“大传统化”又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的、民族的、普遍的救亡工具。近代武术知识生产对民族意识的唤醒与强化,改变了人们对武术作为民间技艺的传统思维取向,确立了“民族图存,必以武力为后盾,而冲锋格斗,国术往往能操胜算”<sup>[64]</sup>的强种强国理念。

### 3 普及与动员: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

近代社会精英通过对武术知识的重新生产,构建出民族复兴的理想化愿景,并以全民化为普及目标,借助近代社会组织、公共社会空间以及民间武术群体等多种途径,实现着新知识的俗世化。

#### 3.1 近代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动

##### 3.1.1 近代武术组织的引领作用

近代武术组织是精英知识生产的空间场域,也是新知识俗世化的主要机构,其在推进武术技术全民化的同时,也将精英知识理念通过多种途径深化到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

首先,面向全民的学员培训。从精武会等民间武术团体蜂起到国家国术馆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才培养与知识传播是近代武术组织实现强种救国最终目的之必由途径。近代武术组织通过招收会员、建立民众练习班、深入军队、学校、社区、工厂、机关任教等方式<sup>[65]</sup>,以武术技艺传授为载体,以“宣讲团”“宣讲会”等为主要宣传方式,进行着健康意识、民族精神和救国理念的知识传递。

其次,各类武术考试、比赛与汇演。从精武会1911年举办的“体育运动大会”,到1923年马良等人筹办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sup>[66]</sup>,再到中央国术馆及其地方国术馆组织的各类国术考试、比赛与汇演,每次群体性武术活动的展开,都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救亡”知识全民化的社会宣传。因此,近代武术的各种考试、比赛与汇演活动并非只是武术人作为表演者的主体性参与,更是千百万普通国民作为观看者、领会者以及救国强种实践者的集体在场。

再次,武术书刊、杂志的发行。近代武术书刊、杂志的发行既有效地提高了武术技术的社会普及

度,又作为文化平台极大地促进了精英化知识生产与思想的民众化传播,为唤起全民尚武之精神,化除宗派、不忘雪耻御侮之志<sup>[67]</sup>,提供了学理支持和精神材料来源。

#### 3.1.2 其他社会团体的协同参与

近代社团建设风靡全国,据孙保良<sup>[68]</sup>统计,截至1911年,全国的社会团体仅商会、教育会和农务会这3项就超过了3000个,而上海从开埠至抗战前,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各类经济和文化组织可能就有上千个<sup>[69]</sup>。近代社团的出现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重新划分,将人从家族的伦理中解放出来形成自由的单子式的个体,又以一定的社会关系把这些个体在特定的目的下重新集结,构成大小不等、形态不一的多元社会力量。

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传播与各社会团体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首先,近代社团对民众的群体化集结为武术知识的社会化传播提供了稳固受众,并以制度化、规范化地动员管理保障了武术知识的传播效果。如广东省商团、上海青年会、女子模范团、中城商业会等社团分别邀请精武会、中华武术会等武术组织成员教授或表演武术<sup>[70]</sup>;中央国术馆也派出教官和指导人员到各机关团体辅导武术训练<sup>[71]</sup>;地方性国术馆之中,如青岛国术馆也分别派遣杨明斋、纪雨人、尹玉章、高凤岭等人,到永裕盐公司工会、市府保卫团、民众教育康乐部等进行武术技能的教授和救国理念的宣讲<sup>[72]</sup>。其次,近代社团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和推动武术知识的生产。“欲图强国,必先强种”“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干城之选”<sup>[73]</sup>成为近代社团重要的动员口号和基本的身体践行方式。以武术康健民众身体,以武术自卫卫国的普遍认知,既是近代武术知识社会化的结果,也是推动武术知识生产的前提与动因。最后,近代社团为“大传统化”武术的维持提供力量支撑。“小传统”范畴下的民间武术通常以小作坊式的师徒传承作为其自在的存在方式,传统的农业耕种生活结合授徒、走镖、护院等辅助性生存措施,维护着旧时拳派“家族式”的延续模范。当近代武术进入“大传统”文化生产之后,近代武术的存在基础转向依靠国家扶持和社会团体资助。精武会若没有“精武三公司”及其众多商业团体的支持,恐怕难以继<sup>[74]</sup>。佛山精武分会的建立,也与工商团体的任孝安、霍伯丽,教育团体

的区声白、黄少强、冯明庵、黄霞赤等人的资助有很大关系<sup>[75]</sup>。中央国术馆及地方性国术馆很多时候也是在各商业团体的捐助下才得以维持,就是经济条件较好的青岛国术馆也经常靠商业赛马和各社会团体捐助及承包各类表演门票来募集资金<sup>[76]</sup>。

近代社会组织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武术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构了武术“大传统”的文化结构、知识体系和发展范式,极大拓展了近代武术知识生产的可能性与俗世化传播的空间。

### 3.2 近代武术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特征

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离不开对社会“公共空间”的改造和利用,这里的“公共空间”既包括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茶馆、戏园、书场、庙会、公园等“公共物理空间”,也包含了哈贝马斯所构建的市民社会性质的“公共领域”。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公共领域”形态不同,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以学会社团、学校、报纸等为主要表现形式<sup>[77]</sup>。

虽然两种场域之间互有重叠,但“公共物理空间”与“公共领域”在概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与“公共物理空间”相对比,“公共领域”更注重话语权力的所有性和个体公开自由的意见表达<sup>[78]</sup>。近代,资产阶级与知识精英成为城市“权力文化网络”的核心<sup>[79]</sup>，“他们开办学校,建立学会社团,创办报刊杂志讨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sup>[80]</sup>因此,“公共领域”在结构上属于“大传统”的文化范畴,是近代社会知识与意义的生产之地,无论就经济还是文化而言,大多数中国平民并没有平等参与的机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物理空间”则有所不同,它更多是下层民众的集散地,人们在其中休闲、娱乐、会友、交易,分享属于他们的风土人情,带有典型的“小传统”文化特征<sup>[81]</sup>。很多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民众,都能够在民间故事、地方戏、评书等形式中接受关于政治、历史、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陶冶<sup>[82]</sup>。民国初期,中国有将近3.3亿“文盲”<sup>[83]</sup>,乡村的“文盲”率甚至达到了95%以上<sup>[84]</sup>,他们无法像社会精英那样来进行现代化读物的阅读。陈独秀认为,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对不识字的人,还是得不到益处。而惟有戏曲改良,才是开通风气的第一方便法门<sup>[85]</sup>。梁启超、欧榘甲、柳亚子等人也认为,通过对民间曲艺的现代化改造,有助于新文化思潮和救国理念向民间普及<sup>[86]</sup>。

近代武术进入“大传统”文化领域之后,学校、学会、社团、报纸刊物等“公共领域”,成为社会精英进行武术知识生产、消费和传播的主要场域<sup>[87]</sup>。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自身的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武术知识俗世化传播范围的有限性。近代“公共领域”知识生产、消费和传播的直接对象是精英阶层及市民社会<sup>[88]</sup>,下层民众难以从这种“大传统”的文化结构中直接获得思想启迪和知识滋养,“不识字”使他们对精英知识的获取必须经过民间艺术形式的再加工才能奏效。近代,以“南向北赵”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流行,为民间各种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文化素材,像王正谊、霍元甲、杜心五等近代武术英雄人物的事迹与精神,成为民间艺术叙事的代表性内容。一时间茶馆、书场等公共场所成为这些武侠故事、武林轶事、民族英雄事迹的主要宣扬阵地和平民理解国家救亡知识的基本途径<sup>[89]</sup>。另外,在尚武思潮的影响下,为迎合世人的口味,戏曲中的武戏内容也逐渐增多,反映英雄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打戏”成为近代戏曲题材的新特征<sup>[90]</sup>。总体而言,武术知识在民众中的多途径传播,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民族情感需求,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以“救亡”为目的之近代武术知识,势必通过俗世化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存在意义,无论是社会精英和市民生活的“公共领域”,还是乡间民众生存的“公共物理空间”,都为近代武术知识普及效果的最大化提供了推动力。

### 3.3 近代乡间武术群体的微观效用

在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传播中,乡间武术群体经过社会精英的理想化再造,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发生转变,并在近代武术的社会化动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一,乡间武术群体在吸收国技、国术、体育等时代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近代救亡宣传,重新规划自身的发展路向。很多拳师开始以强健国民身体、振奋民族精神为目标建立拳社,授拳授艺<sup>[91]</sup>。据统计,仅山西省就有乡间武术拳社560余个<sup>[92]</sup>,山东省栖霞县100多个村庄中均设有拳房,莱成县的拳场几乎遍布各村<sup>[93]</sup>,甚至一个村庄有多个拳场<sup>[94]</sup>。与传统的乡村武术拳场不同,近代拳场多以“国技”“国术”“体育”等新名称,以及“学校”“会”“社”“馆”等新形式出现,如陵川玉泉村国术学校、俊英体育

社、群英武术社、潍县体育社等。乡间武术群体观念的转化,为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做好了准备,他们既充当了新武术知识的接受者,也扮演了面向普通民众的新知识的传播者。

其二,在政府的整编下,民间拳场转变为当地县、乡、村国术练习所或国术馆支部。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后,武术就有了统一的“国家机构”,国家也成为近代武术发展的“主体性”力量。近代武术的国家化表现为国家对民间武术力量的重新整合,早在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就有意将精武会纳入国术馆系统,虽经过陈公哲的努力最终豁免<sup>[95]</sup>,但足以表现出国家对民间武术组织的态度。在此形势下,很多地方性民间武术组织都经过了政府整编,转化为当地的国术馆支部或国术练习所。如青岛国术馆为统一管理,禁止民众私自设立拳场随意授拳,设立拳场者必须登记在案,改为国术练习所,统一由青岛国术馆管理和支配。

其三,乡间拳师的培训与改造。当武术作为国家募集社会力量的手段来推动全民武化时,乡间武术群体作为武术救国话语的力量在场,其整体素养的更新十分必要。如山东国术馆为提高县、乡、村国术教练的文化和技能水平,曾于1932年连续开办了3期面对全省各级国术馆教员的专业培训班,期间不但培训了新式武术的教学方法,还讲授了国文、常识、生理卫生及武术原理等课程<sup>[96]</sup>。通过必要的以统一培训为主要方式的群体性改造,乡间拳师可以教员的身份进入县、乡、村的学校和村镇国术支部任教。像菏泽县梅花拳拳场十三世宗师,司中元、高雨亭、吴体胖等人就分别任教于山东省第六中学、菏泽县国术馆等处,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其中,跟随高雨亭学习的六中学生王丕襄、王丕廉兄弟均成为了抗日救国的高级将领<sup>[97]</sup>。

近代武术知识的俗世化是一种由社会精英主导的全民化的社会动员,在这一全民化动员中乡间武术群体是武术知识发生作用的最后关节,通过他们的宣导、组织和教习,近代武术知识才得以深入人们的生活日常,影响着人们对国家救亡的理解和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态度。

#### 4 结语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

正是这“大变局”给了武术一个“千年不遇”的蜕变机遇,使武术“脱胎换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大世界”。在近代中国“百不如人”的文化反观中,社会精英带着治愈国民“病夫”身体的夙愿,将武术拖入“大传统”的文化结构内改造,使其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牵连在一起”<sup>[98]</sup>,导演了一场“武术话语爆炸”的宏伟乐章。社会精英的介入改变了传统武术的权力结构,生产出武术新的知识范式,并通过多种途径俗世化为国民的日常生活。理论而言,没有近代武术的“大传统化”,就没有当代武术的盛况,其为当代武术的学术化、学科化、国际化、竞技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以高度自信的姿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新时代,武术应怎样协调“大小传统”并联式发展的双重优势,面对西方主导的“强势戏剧”,勾绘出一幅具有创造性与普适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锦绣蓝图,是当代武术“大传统”知识生产的新课题。

#### 参考文献:

- [1] 张荣华.文化史研究中的大、小传统关系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73-82.
- [2]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3] 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卷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4]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 戴国斌.门户对拳种、流派的生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4): 77-82.
- [6] 叶鹏,蔡宝忠.近代民间拳师都市化流向对武术传播与流派分化的影响[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6): 27-28.
- [7] 严复.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9]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0]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四[M].上海:中华书局,1998.
- [11] 丁丽萍.吴越武术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8.
- [12] 陈铁笙.精武本纪[M].上海:上海精武体育总会,1919.
- [13] 刘雅媚,郭强,杨祥全.天津中华武士会寻脉[J].体育文化导刊,2013(5): 126-128.
- [14] 向恺然.向恺然辑[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 [15] 王新午.我的国术经验谈[J].求是月刊,1936,2(4): 124.
- [16] 田镇峰.由决心毅力说到我们招“技击实验”生[J].求是月刊,1935,1(4): 117-119.
- [17] 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消息—变更办法[J].中央国术旬



- 刊,1929(3): 69.
- [18] 张之江. 国术与体育[J]. 天津文津月刊,1932(1): 1-5.
- [19] 张银行,李吉远. 使命与扬武: 精武体育会与武术近现代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0,26(12): 41-46.
- [20] 蔡元培. 蔡元培教育名篇[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21] 吴荣煦. 精武之人格[J]. 佛山精武月刊(言论), 1926, 2(12): 2-3.
- [22] 陈炳藜. 精武与人格[J]. 佛山精武月刊, 1925, 1(3): 1-4.
- [23] 张之江. 第五次讲演遵守党义国法[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
- [24] 庞玉森. 中央国术馆史[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6.
- [25]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7.
- [26] 匡淑平. “西学东渐”与上海近代体育的嬗变(1843-1949年)[J]. 体育科研, 2016, 37(5): 18-24.
- [27] 梁启超. 新民说·论尚武[M]. 新民丛报汇编, 1903.
- [28] 戴国斌. 武术的文化生产[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 [29] 马良. 中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余年纪略[J]. 体育与卫生 1924, 3(3): 3.
- [30] 编者. 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J]. 东方杂志, 1908(6): 99-101.
- [31] 麦克乐. 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M]. 最近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 1922.
- [32] 王健吾. 复兴民族体育与提倡民族体育——写在程登科先生我们应否提倡中国的体育后[J]. 勤奋体育月报, 1937, 4(4): 275-277.
- [33] 金恩忠. 国术丛书[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 [34] 沈书珽. 提倡国技刍言[J]. 体育研究会会刊, 1918: 1-2.
- [35] 刘慎旃. 体育救国论[J]. 勤奋体育月报, 1935, 2(11): 713-719.
- [36] 陈敦正. 复兴民族与提倡国术之意义[J]. 国术周刊, 1934, (128): 2.
- [37] 中央国术馆. 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 南京: 大陆印书馆, 1931.
- [38]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卷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9] 靳翼青. 靳翼青先生演说词[J]. 体育月刊, 1936, 4(10): 10.
- [40] 陈此生. 我为什么要加入精武会——精武会对于人生有怎地关系[J]. 佛山精武月刊, 1925, 1(1): 10-14.
- [41] 龙毓莹. 辟“静坐”[J]. 体育周报特刊, 1920: 105-116.
- [42] 奋翻生. 中国近代史体育文选[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 [43] 听驼. 国术将来所负之希望[J]. 1938, 5(12): 1-5.
- [44] 向恺然, 陈铁生, 唐豪, 等. 国技大观[M]. 上海: 上海书店, 1923.
- [45] 戴愀余. 马千里[J]. 佛山精武月刊, 1925, 1(1): 15-18.
- [46] 陈布雷. 中国近代史体育文选[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 [47] 禅者. 佛山精武与教育[J]. 佛山精武月刊, 1925, 1(2): 50-51.
- [48] 编者. 许馆长赴晋讲学记[J]. 体育月刊, 1936, 4(9): 13-16.
- [49] 李铁鸣. 对于我之我说[J]. 佛山精武月刊, 1925, 1(2): 8-10.
- [50] 张之江. 国术与国难[M]. 南京: 中央国术馆, 1932.
- [51] 张之江. 敬劝同胞速练国术备纾国难书[J]. 南京国术周刊, 1932(10): 84.
- [52] 梁启超. 新民说·论尚武[J]. 新民丛报, 1903: 7-14.
- [53] 袁宗泽. 社会体育随谈[J]. 体育研究与通讯, 1934, 2(1): 75-79.
- [54] 袁道冲. 武德的模范人物[J]. 体育月刊, 1936, 4(1): 1-5.
- [55] 林辉锋. 张之江国术思想述略[J]. 广东社会科学, 2014(6): 140-148.
- [56] 编者. 李芳宸先生在山东国术馆之训话[J]. 求是月刊, 1936, 2(3): 119.
- [57] 李帆, 邱涛. 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5.
- [58]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 1995(6): 17-21.
- [59] 熊锡元. 试论制约民族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J]. 民族研究, 1993(3): 1-6.
- [60] 萧忠国. 战时民国体育[J]. 国民体育季刊, 1941, 1(1): 32-38.
- [61] 张之江. 第五次讲演遵守党文国法[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 14-15.
- [62] 中央国术馆. 本馆宣言[J]. 中央国术馆汇刊, 1928: 7.
- [63] 张之江. 张子萱先生演讲词[J]. 体育月刊 1936, 4(9): 20-22.
- [64] 蒋中正. 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 第11卷[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8.
- [65] 麻晨俊, 汤卫东, 高亮. 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模式及启示[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2): 58-65.
- [66] 马廉祯. 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J]. 回族研究, 2012, 22(1): 37-44.
- [67] 吉灿忠, 纪铭霞, 郭强. 中央国术馆馆刊及其社会功能[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9, 43(2): 115-121.
- [68] 孙保良. 中国的社与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69] 陆兴龙. 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变化[J]. 上海经济研究, 2005(1): 86-92.
- [70] 陌雅. 上海中华武术会[J]. 体育文史, 1987, (6): 51.
- [71] 陈长河. 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J]. 历史档案, 2009(3): 108-113.
- [72] 王开文. 青岛武术研究(1920-1949)[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9.
- [73] 上海商团小史. 辛亥革命(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74] 王焱源. 武术名家陈公哲与精武体育会[J]. 兰台世界, 2013, 4(33): 138-139.
- [75] 韩健. 民国中期佛山精武体育会的社会教育活动探析[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8(5): 64-69.
- [76] 青岛市档案馆,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青岛商会档案史料选编·社会事务卷[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 [77] 许纪霖.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 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 史林, 2003(2): 77-89, 123-124.
- [78] 许鑫. 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1815-1949)[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 18(5): 74-82.

- [79] 许纪霖.近代上海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精英(1900—1937年)[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58-67.
- [80]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11):138-145.
- [81] 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J].历史研究,2001(5):41-53,188-189.
- [82] 王笛.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J].近代史研究,2009(3):77-94.
- [83] 谢培.清末和民国时期上海的识字扫盲教育[J].上海成人教育,1996(4):41-43.
- [84] 浅井加叶子.当代中国扫盲考察[M].王国勋,刘岳斌,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 [85]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86] 孙建杰.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8:32,38-39.
- [87] 戚少枫,郝延军.清末教育改革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23-128.
- [8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89] 池若飞.武侠文学的现代口头传播——以评书为例[J].浙江学刊,2019(3):45-52.
- [90] 朱琳.昆曲与近世江南社会生活[D].苏州:苏州大学,2006.
- [91] 林伯原.论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变化[J].体育科学,1992(4):11-15.
- [92] 靳志鑫.媒体视野中的民国山西武术[D].临汾:中北大学,2014.
- [93] 李成银,申玉山.近代中国武术传播的新特点[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1):61-65.
- [94] 田镇峯.技击漫谈(四则)[J].求是月刊,1935,2(3):91-95.
- [95] 刘靖.中央国术馆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3.
- [96] 张洪涛.山东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 [97] 赵延军.菏泽武术文化的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
- [98] 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 作者贡献声明:

王占涛:论文主体构思与撰写;戴国斌:论文思路把关、主体框架审定与整体把控;邵娜:资料整理与论文校对。

## From “Little Tradition” to “Great Tradition”: The Power Transfer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Modern Wushu

WANG Zhantao<sup>1,2</sup>, DAI Guobing<sup>1</sup>, SHAO Na<sup>3</sup>

(1.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China; 3.Qisheng Senior Middle School of Zibo, Zibo 25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theories as the main perspective, and re-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Wushu.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production of modern Wushu,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ain 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 social elite’s participation and dominan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ushu culture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and knowledge. The research claims that under the modern theme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elites has changed the original power structure of Wushu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for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aking Wushu enter the category of “Great Tradit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paradigm. A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ocial elite concept, Wushu theory can only enter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after the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finally form the national cohes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Great Tradition; Little Tradition; modern Wushu; power transfer; knowledge production